

正能量

执政新风助推中国梦

刘昀献 著

正能量

执政新风助推中国梦

刘昀献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政能量:执政新风助推中国梦 / 刘昀献著.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6. 7

ISBN 978-7-308-14822-1

I . ①政… II . ①刘… III . ①中国共产党—执政—研究 IV . ①D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49376 号

政能量:执政新风助推中国梦

刘昀献 著

责任编辑 葛娟

封面设计 春天书装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07)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杭州中大图文设计有限公司

印 刷 杭州日报报业集团盛元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32

印 张 15

字 数 270 千

版 印 次 2016 年 7 月第 1 版 201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14822-1

定 价 4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中心联系方式: 0571—88925591; <http://zjdxcbs.tmall.com>

前　言

历史总是在惊涛骇浪中前进的，总要穿越重重关口；漫漫征程上，紧要处往往只有关键几步。应该说今天的中国，正处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节点上。

2012年11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第一次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在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时的重要讲话中进一步阐释了“中国梦”的精神要义。“中国梦”将中国的过去、现在、未来联系起来，将国家、社会、个人联系起来，将中国、世界、人类联系起来，体现了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继往开来、高瞻远瞩的深邃眼光，指明了当代中国的发展走向，是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宣言和指引中华巨轮扬帆远航的旗帜。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是要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既深深体现了今天中国人的理想，也深深反映了我们先人不懈追求进步的光荣传统。“中国梦”不是眼睛向着历史，简单地重寻昔日的荣光；不是要恢复古代中国鼎盛时期的疆域版图，而是从今天的现实出发，扎实解决改革开放30多年来连续快速发展而带来的诸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推动中华民族永续发展。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必须弘扬中国精神，这就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必须凝聚中国力量，这就是全国各族人民大团结的力量。“中国梦”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13亿乃至更多人口的国度中实现共同富裕，在为西方主导的世界格局中实现大国的和平崛起，道路艰难崎岖，前方险阻重重，只有凝聚起亿万人民为梦想而奋斗的磅礴力量，才能冲破险阻、跨越险滩，梦想成真。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全国人民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困难和挑战，坚定不移深化改革开放，大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凝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强大力量，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征程。习近平作为中国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围绕怎样治国理政、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形成了治国理政的新方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理论和国家学说。

本人在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课题“中国共产党应对执政风险和考验研究”的过程中，认真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思想，有感于习近平总书记的执政新风，作为课题的阶段性成果先后在《光明日报》、《人民论坛》等报刊发表了30余篇相关论文并被人民网《学者专栏》收录，其中有十余篇次被《新华文摘》、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等转载。浙江大学出版社袁亚春总编在得悉首席专家意愿及有关课题研究和课题阶段性成果的影响后，欣然同意将部分论文结集出版；以宣传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新方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汇集正能量。本书根据理论阐述和问题解读的需要，还选取了本人在党的十八大前发表的相关文章，如发表在《求是》2010年第5期的《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2007年2月27日发表在《人民日报》的《团结共事风气正》等。本书所选取的文章根据逻辑顺序阐释了中国共产党如何破解20世纪之谜，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如何应对执政风险，实现中国共产党的当代使命；如何弘扬中国精神，汇聚实现中国梦的正能量；如何树立执政新风，为实现中国梦把牢航向；如何高擎伟大旗帜，引领中华巨轮扬帆远航。进而形成前后相续的“雄关漫道真如铁：在问题与困境中前行的中国”、“人间正道是沧桑：中国梦与中国道路的探索”、“风物长宜放眼量：中国梦与中国精神的弘扬”、“不畏浮云遮望眼：中国梦与中国力量的凝聚”、“长风破浪会有时：共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五个篇章。葛娟编辑和李苗苗编辑从遴选文章到编辑出版付出了大量心血。在此，向袁亚春总编、葛娟编辑及关心本书出版的各位出版社领导和编辑致以衷心感谢。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亿万中华儿女的宏图壮志。领导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是历史和人民赋予中国共产党

的神圣使命。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下，中华大地新风扑面，亿万人民正精神振奋、意气奋发地为实现中国梦而奋斗。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已是跃出东方地平线的一轮绚丽红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13亿中华儿女高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同心同德、艰苦奋斗，到21世纪中叶，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必将巍然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刘昀献

2016年1月

目 录

第一章 雄关漫道真如铁:在问题与困境中前行的中国	1
百年困惑的破解	3
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探索与超越	14
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当代思考	29
知识经济与资本主义的历史命运	37
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基本问题的思考	51
第二章 人间正道是沧桑:中国梦与中国道路的探索	65
“中国梦”与中国共产党的当代使命	67
跳出历史周期律要靠“两个务必”	73
“两个务必”是应对执政风险的锐利武器	77
中国共产党在当代面临的十大执政风险	82
国外政党联系群众的路径研究	99
第三章 风物长宜放眼量:中国梦与中国精神的弘扬	113
用艰苦奋斗精神汇聚实现中国梦的强大正能量	115
新时期党的建设总体布局的形成发展与实践创新	126
科学发展观推动人类文明的伟大转型	143
切实转变领导干部作风	153
破除“四风”需对症下药	157



第四章 不畏浮云遮望眼：中国梦与中国力量的凝聚	161
坚持群众路线必须强化党的作风建设	163
推进“四步走战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	173
狠刹“四风”是密切党群关系的着力点	180
关键就在“常”、“长”二字	188
公车改革是转变干部作风和反腐倡廉建设的重要抓手	193
第五章 长风破浪会有时：共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203
“中国梦”引领中华巨轮扬帆远航	205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引领中国发展进步	214
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	217
团结共事风气正	220
科学发展观视野下的生态文明建设	222
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方略的三大鲜明特点	225

第一章

雄关漫道真如铁： 在问题与困境中前行的中国

百年困惑的破解^①

——论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国家首先实现社会主义的必然性

摘要:社会主义首先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国家取得胜利有无历史必然性,这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史上长期存在争议。从历史发展实践来看,人类进入文明时代以后新旧制度的三次交替都不是首先发生在旧制度最发达的国家,而是发生在旧制度相对不太发达的国家。这说明新制度首先产生在旧制度“薄弱环节”的国家是一个必然规律。因为,旧制度比较成熟的国家,国家政权的力量过于强大,代表新制度的阶级力量难以得到充分发展并战胜它,而国家政权力量相对弱的国家,新兴阶级就容易战胜它。同时,旧制度比较发达的国家,统治阶级积累了丰富的统治经验和方法,而且拥有丰富的物质的和精神的统治资源,可以维持政权的运转和社会的稳定。由新制度首先产生在旧制度不太发达的国家这一规律所决定,社会主义制度代替资本主义制度将是一个长期、曲折的过程。

关键词: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实现;社会主义;必然性

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国家能不能首先实现社会主义,为什么这些国家能够先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进入社会主义社会,这里有没有历史的必然性,有没有客观规律性可循?这是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史上长期存在争议、困惑了人们一个世纪的历史难题。早在俄国二月革命之后,列宁针对革命后形成的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提出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要求时,当时就遭到党内外不少人的反对,第二国际教条主义者和孟什维克提出俄国的生产力水平远未达到可以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水平;随之,考茨基更是把苏俄的社会主义诅咒为“活不成的”早产儿。苏东剧变后,又有人企图以

^① 本篇载于《理论学刊》2012年第7期。



此为据否定十月革命的必然性,说它是在不具备建设社会主义的主客观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是“病态的早产儿”、“人工的流产儿”,是后来种种危机和剧变解体的“原罪”。可以说,对十月革命的必然性的否定由来已久。由于现有的社会主义国家大都是在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建立起来的,以上这些观点也是对其他国家社会主义革命的必然性的质疑,因此,必须予以科学的解答,才能坚定人们的社会主义信念,才能增强人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

为什么这一问题自俄国十月革命以来会一直萦绕在人们心头,一直为人们所关注,而且每逢历史发展的转折关头就会被突出地提出并引起激烈的争论呢?我们认为,根本原因在于过去人们往往是从经济不发达国家走向社会主义的特殊条件,即从革命发生的偶然性上来认识和看待这一问题的,既然它是特殊历史条件的产物,没有必然性,就难免有“人为制造”之嫌;由于理论的不彻底性,自然不能说服人,更难免为人诟病。历史的必然性是从实践中产生的,人类历史的实践告诉我们:社会制度的更替首先是从旧制度不很发达的国家或地区开始的,这是历史的必然。社会主义首先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国家取得胜利,这不是历史的偶然,而是历史的必然规律!

一、以往理论界关于社会主义首先在经济文化 相对落后国家取得胜利问题的论述

我国理论界对社会主义首先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国家取得胜利问题的论述,主要是围绕两个问题展开的:一是社会主义首先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国家取得胜利是否符合历史发展规律;二是俄国是否具备了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

关于社会主义首先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国家取得胜利是否符合历史发展规律这一问题,我国理论界基本上沿用了列宁的观点。

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列宁第一个提出了社会主义首先在经济不发达国家胜利的理论,并在一个经济不发达的国家把社会主义由理论变成了现实。当第二国际的首领们把西欧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民主发展的道路,看作走向社会主义的唯一途径,以“俄国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足以实现社会主义的水平”为由,反对十月革命,否定俄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可能时,列宁批评他们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一窍不通,不懂得“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

仅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列宁进而指出：“他们谁也没有想到自问一下：遇到第一次帝国主义战争时所造成那种革命形势的人民，在毫无出路的处境影响下，难道不能挺身起来斗争吗？”并反诘道：“既然建立社会主义需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平（虽然谁也说不出这个一定的‘文化水平’究竟是什么样的，因为这在各个西欧国家都是不同的），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赶上别国人民呢？”从列宁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它是从历史发展的必然与偶然的辩证法来认识和对待这一问题的，即在人类历史的发展中，社会主义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首先胜利是一般规律，但由于特殊的历史条件的作用，历史发展的顺序和形式会发生变化，新制度可以在旧制度比较不发达的国家里先产生。

对于列宁的阐释，我们应从其当时所处的复杂环境来理解。一方面，理论创新需要巨大的勇气，同时也充满风险。列宁虽然从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的要求出发，以大无畏的理论勇气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共同胜利说”，提出了包含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国家的“一国胜利说”，但在与以马克思主义“正统理论家”自居的第二国际教条主义的论战中，它是无法也不能公开打出理论创新的旗帜的，倘若那样，就会遭到对手攻击。考茨基就曾多次攻击“一国胜利说”是“违反马克思的这一学说的：任何国家的人民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一个法令来废除自然的发展阶段”。列宁的解释实际上就是针对考茨基的攻击的。为了表明对马克思主义的忠诚，他不能标新立异，只能千方百计从理论上说明自己的观点与马克思、恩格斯“共同胜利说”的一致性。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诞生后，以其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科学性，迅速赢得了工人群众的拥护，在工人运动中占据了统治地位。马克思主义整体理论的科学性和影响力，使人们忽视了其个别结论的时效性，容易把其每个具体论断都当作不可更改的定律。正因为这样，为了动员和发动人民群众起来斗争，列宁只能把自己的理论创新与马克思主义原有结论统一起来，从而才能组织和教育群众，推动革命事业的胜利发展。

在我国出版的权威教科书中基本上都是沿用列宁的说法。譬如范若愚、江流主编的《科学社会主义概论——中国社会主义基本问题》一书，以斯巴达人、日耳曼人，以及罗马尼亚等多瑙河流域的国家未经历奴隶社会，直接由原始社会进入封建农奴社会，美国没有经过封建社会而直接进入资本主义社会

为例,说明了“历史常常是跳跃式地和曲折地前进的”,虽然“一切产生出来的东西,都一定要死亡”,但是,产生和死亡的时间和顺序,并不总是一模一样。社会主义首先在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取得胜利,这种历史发展的顺序和形式的变化,并没有否定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并未越出人类社会发展的共同道路。

关于俄国是否具备了社会主义革命条件的问题,我国理论界主要是从革命的主客观条件和革命形势的形成方面来论述的,而且特别强调俄国特殊的历史条件。

首先在对革命条件的认识问题上,认为革命条件不仅包括经济条件,也包括政治等条件。“革命的发生归根到底有其经济动因,但并不是纯粹经济的过程,也不只是由经济因素决定的。在这里,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各个阶级和各种社会力量的对比,以及国际条件等因素都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这就是说,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是社会主义革命的重要前提,但决不能机械地理解为任何一个国家无论具体历史条件怎样都只有在生产力发展已经到了相当水平之后才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因为“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是起着决定作用的,还有政治的其他因素”。即使在生产力水平没有达到较高水平,但是如果革命的其他条件具备的条件下,社会主义革命也是可能的。

其次,十月革命前俄国是否具备了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理论界普遍认为,第一,俄国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现代经济,有了现代最先进的阶级——工人阶级及其先锋队工人阶级政党。第二,俄国已具备了革命形势。“由于战争的破坏,帝国主义的一切矛盾在这里特别突出、尖锐。”从客观上看,帝国主义战争,使帝国主义各国彼此削弱并在资本主义链条上出现薄弱环节,十月革命前的沙皇俄国是帝国主义一切矛盾的集合点,正是这些矛盾集合点上孕育着革命。一是统治阶级已经不能照旧不变地维持其统治了。大战使统治阶级面临严重的政治危机,这种危机给被压迫阶级的革命发动造成了一个突破口。二是被压迫阶级的贫困和灾难异乎寻常地加剧,已不能照旧生活下去了。三是广大人民群众对战争带来的灾难已无法忍受,资产阶级政府极端孤立,大大削弱,出现了将被推翻的危机。从主观上看,俄国革命力量日益强大。俄国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使工农群众受到了非常多的政治教育,并把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革命与农民反对地主的革命结合了起来,在工农联盟的基础上,汇合成一股强大的革命洪流,是冲破帝国主义阵线、取得革命胜利

的基本力量。因而，俄国已经具备了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

二、社会主义首先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 国家取得胜利是历史的必然

如果说当年列宁在提出社会主义首先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国家取得胜利的理论时，由于种种原因，还只能从偶然性和俄国的特殊条件来论证，不便把其上升到必然规律的高度的话，我们今天则有必要从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高度来认识和把握其规律性的意义。

社会历史的发展过程往往比纯粹的逻辑推理复杂得多。理论来源于实践，必须接受实践的评判，因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从人类历史的发展实践来看，人类进入文明时代以后新旧制度的三次交替都不是首先发生在旧制度最发达的国家，而是发生在旧制度相对不太发达的国家：封建制度不是首先出现在奴隶制度最发达的古埃及，而是首先产生于奴隶制度相对古埃及来说不太发达的中国；资本主义制度没有首先产生在封建社会最发达的中国，而是首先产生于封建势力相对薄弱的英国；社会主义制度也不是首先产生在当时资本主义制度最成熟的英国，而是首先产生于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俄国。这说明新制度首先产生在旧制度“薄弱环节”的国家是一个必然规律。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从理论上讲，一是旧制度比较成熟的国家，国家政权的力量过于强大，代表新制度的阶级力量难以得到充分发展并战胜它，而国家政权力量相对弱的国家，新兴阶级就容易战胜它。二是旧制度比较发达的国家，统治阶级积累了丰富的统治经验和方法，而且拥有丰富的物质的和精神的统治资源，它不仅善于运用国家机器即暴力来维护自己的统治，而且会灵活运用鞭子和糖果两手，软硬兼施，甚至收买被统治阶级中的部分精英为自己服务，维持政权的运转和社会的稳定。

我们可以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的诞生为例来说明这一问题。

为什么资本主义制度不是首先产生在封建社会最发达的中国，而是首先产生在英国呢？这是因为，中国的封建社会长达 2000 多年，封建社会关系比较成熟，国家政权的力量过于强大，资本主义难以得到充分发展。比如 19 世纪前的中国，国家垄断了重要的工业部门，压制工业的发展，忽视发明创造活

动，随意侵犯私有财产，使企业和个人的所有权得不到保障，因而不可能产生复杂的企业组织来进行高水平的分工和积累；同时，国家阻断海外贸易，严格控制人们的思想，对社会精英只给予仕途的激励，还实行了强硬却不合时宜的产业政策——重农抑工商，直接干涉经济活动。所以，在当时的封建中央集权制度下，中国缺乏对私人创新的激励机制，交易效率低下，交易费用过高，从而抑制了分工演进和专业化水平的提高，直接影响当时中国的工业化进程，虽然也有许多属于市场经济的因子和活动，但却没有发展资本主义的可能。正因为如此，资本主义制度没有首先出现在封建生产关系最成熟的中国等国，而是首先在封建国家政权力量比较弱的英国产生了。

为什么社会主义制度没有首先产生在资本主义最发达的英国，而是产生于俄国呢？

社会主义制度不是也不可能首先产生在资本主义制度最成熟的国家。社会主义制度首先在俄中等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国家产生，这已是历史事实，无须赘述。那么，为什么社会主义制度不可能首先产生在资本主义制度最成熟的英国呢？

首先，从经济上看，19世纪末的英国依然保持着世界工业霸权地位，同时还掌握着世界殖民霸权，占有世界广大的市场，保持着世界贸易、银行资本和海军、商船的优势。它是当时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垄断资产阶级利用从殖民地掠夺来的利润，直接和间接地收买工人阶级，造成工人运动的衰落，导致国内阶级斗争的钝化。

在殖民地占有方面，1900年英国占有278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它拥有的殖民地占世界首位；在世界贸易中，英国占世界第一位，1890年它的出口总额为4.207亿磅，其商船吨位在世界的比重为48%。英国的银行业在世界上是最发达的。作为世界金融中心的伦敦城，银行鳞次栉比，除了英国本国的银行外，几百家外国银行也云集在这里；世界各国的资本家都来这里投资和放债。英镑成为世界贸易的结算单位。这种优势使英国资产阶级不仅剥削本国工人，而且剥削着全世界。它的国民收入理所当然地大大增加。垄断资产阶级可以把攫取到的巨额财富拿出一部分来，直接和间接地、公开和秘密地“收买无产阶级”，它不仅收买了工人的上层，使他们成为“工人贵族”，而且还使一部分工人群众资产阶级化，甘愿受“工人贵族”或领取资产阶级酬金的人的领导。根据查尔斯·布思的著名著作《伦敦人民的生活和劳动》的

调查材料，19世纪80年代末，有固定职业、工资较高、生活还不错的工人有216万人，占伦敦人口总数的51.5%。恩格斯在1874年指出：“至于说到工人，首先必须确认，自从五十年代宪章派政党崩溃以来，英国再也没有工人自己的政党。这种情况在这个国家里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这里的工人阶级从大工业的巨大高涨中得到的利益，比任何地方的工人阶级所得的要多，在英国称霸世界市场的情况下也不能不是这样。”1883年，恩格斯又指出：“参与世界市场的统治，过去是而且现在依然是英国工人在政治上消极无为的经济基础。他们既然充当了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利用这种垄断地位的尾巴，并且毕竟总是分享资产阶级的利润，那他们自然就会在政治方面充当‘大自由党’的尾巴。”

其次，从政治上看，英国垄断资产阶级的统治策略趋于成熟，方法趋于多样化，经验日益丰富，蒙骗工人的艺术日益精巧，使工人丧失了革命斗志。一是虚伪的民主制蒙蔽了工人的眼睛。统治阶级通过实行改良、让步等方法，逐步扩大了一些阶层的政治权力。1884年，英国进行了第三次议会改革，选民人数由1883年的315万人，增至1886年的570万人。这种改革使英国逐步扩大了资产阶级民主，“已经大大接近于‘普选权’”。这就造成工人群众对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抱着普遍的幻想。似乎英国的民主给工人带来了高度形式的权利：言论出版和集会自由的权利，组织罢工的权利，被选举为官吏的权利，社会平等的权利，等等。似乎英国“民主高度发展，不存在军国主义，有组织的工联力量巨大，英国国外投资的增长削弱了英国企业主和英国工人之间的对抗”，工人们在政治方面已没有更多的苦难，有的只是关于工资、工作日、工作条件等的经济问题。这就是英国工人运动为什么“一直在为增加工资和缩短工作时间而罢工的狭小圈子里无出路地打转”的原因。二是精巧的两党政治制度阻碍了独立的真正工人政党的建立。18世纪以来的英国政治，表现为两大资产阶级政党，即托利党（保守党）和辉格党（自由党）互相轮换执政的局面。1868年至19世纪末，英国的两党制度更具有典型性，而且两个党在本质上已不存在什么差别，都是垄断资产阶级利益的代表，都是充当垄断资产阶级进行两手交替统治的工具。它们争论的焦点是帝国主义时代如何保持英国的霸权地位和如何对付社会主义运动问题。他们狡黠地声称这是为了工人的利益。他们在一些细小的问题上进行有声有色的论争，目的在于欺骗人民，巩固自己的统治。在自由党先后几次执政期间，于